·专题研究 ·

亚历山大东征与丝绸之路开通

杨 巨 平

提　要：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及希腊化世界的形成推进了从中亚、印度到东地中海、欧洲之间古代诸文明地区的文化交流和经济来往。张骞之前，沟通亚非欧、连接东西方的三条商路已经出现；希腊文化在希腊—马其顿人统治及影响地区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传播，并在一定程度上与东方文化相汇合；以阿姆河为中心，巴克特里亚希腊人南下印度，东向赛里斯、弗里尼，有可能越过帕米尔进入塔里木盆地。这些都为丝绸之路的开通和延伸以及东西方物质和文化的进一步交流和融合奠定了坚实而广阔的基础。就丝绸之路全线贯通而言，亚历山大东征和张骞通西域都发挥了同样的历史作用。

关键词：亚历山大　张骞　希腊化　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在汉武帝之时开通，张骞功不可没。但张骞通西域的目的并非打开丝绸贸易的大门，而是为了实现汉武帝联合月氏、合击匈奴、开拓西部疆土、建立强大汉帝国的雄心壮志。同样，希腊—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在公元前334年大规模向东方进军，也并非为了得到遥远的、朦胧的所谓“赛里斯人”(Seres) 的丝绸，而是为了征服波斯帝国，并进而征服整个世界。① 但历史的结局往往和历史创造者的主观愿望不相一致。汉代对西域的控制时断时续，亚历山大帝国昙花一现，他的部将们所建立的希腊化王国在公元前1世纪末之前都陆续衰落，不复存在。唯有丝绸之路仍然作为历史的见证，继续发挥着沟通东西方物质与文化交流的重要作用。国内外学者在论及丝绸之路开通时，大多只强调张骞的西域凿空，而忽略了亚历山大及其后继者所开创的希腊化世界在其中所发挥的客观作用。为此，本文试图从丝绸之路的另一端，逆向考察希腊—马其顿人的东进是如何推动了丝绸之路的开通、延伸与延续，希腊化文明的信息是如何通过张骞传入中原的。

① 关于亚历山大东征的最终目标，古典作家阿利安有较为明确的记载。伊苏斯之战后，大流士三世曾写信给亚历山大，愿让与幼发拉底河以西的土地以换取亚历山大的停战。他的回答是，他要的是整个波斯帝国而非其中的一部分。占领印度河上游后，亚历山大执意要向恒河流域和东边的大海进军。他误以为，这个东海是和赫卡尼亚海（Hyrcanian Sea，即里海）连在一起的，他所知的整个大地都由海洋所环抱，因此，可从印度湾到波斯湾，或从波斯湾绕过利比亚（非洲）到达赫拉克勒斯石柱（the Pillars of Heracles，今直布罗陀海峡）。这样他就会征服全世界。见阿利安：《亚历山大远征记》，李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79、185—186页。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亚历山大之前东西方文明之间的接触与传闻

亚历山大东征之前，远在欧亚大陆两端的两大文明中心——希腊和中国互有传闻。“赛里斯”就是当时的希腊人对东方一个可与北印度相提并论的国家的称谓。① 尽管古典作家关于它的具体地理位置说法不一，但位于遥远的东方且为产丝之国则渐成共识。② “赛里斯”后来也就成了西方传说中对中国的代称。希罗多德曾记载了一位名叫阿里斯铁阿斯（Aristeas）的希腊人的远东之游，他穿过斯基泰人（Scythian）的活动区域，最远曾至伊塞顿人（Issedones）之地。③ 据学者考证，所谓的伊塞顿人活动区域大致应在乌拉尔以东，直至天山、阿尔泰山之间，也有学者推测他们曾远达塔里木盆地或楼兰以东、敦煌一带。④ 上个世纪，考古学者在德国的一座克尔特人首领墓葬（公元前 6 世纪）中发现了丝绸织物残片，⑤ 在阿尔泰巴泽雷克古墓（公元前 1000 年代中叶至公元前 3 世纪）发现了保存完好的中国凤凰刺绣和山字纹铜镜。⑥ 中国中原地区的物品在远及西欧的出现，说明上古时期欧亚草原之路的存在。游牧于黑海、里海、咸海一带的斯基泰人和其他游牧民族无疑是欧亚草原之路的开拓者、先行者。但这条交通线是游移不定、时断时续的。由于游牧民族的流动性和游牧文明相对于农耕文明的落后性，这条道路没有、也不可能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流的主渠道。

文明的交流是以文明的互动为前提。早在爱琴文明时期，希腊地区的居民就与相邻的埃及、小亚、西亚等地区的古老文明有了接触。但作为一个独立成熟的文明与东方文明对等交往则是在波斯帝国时期。公元前 6 世纪中期，波斯帝国崛起于伊朗高原，并很快向外（主要是东西两面）扩张。小亚沿岸的希腊殖民城邦沦陷，希腊本土面临存亡的考验。然而正是这种对立和交往，使希腊人对波斯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从而揭开了希腊文明与东方文明实质性交流的新篇

---

① 此名称是生活于公元前 5—前 4 世纪之交的希腊医生兼史家克泰西亚斯（Ctesias）首先提出的。他曾担任波斯宫廷御医，可能是在波斯听到了关于赛里斯的传闻。虽然这一资料的可靠性受到西方学者 H. 裕尔、戈岱司和中国学者张星烺的质疑，裕尔特别指出原因在于其仅见于《福尔乌斯文库》（*Bibliotheca of Photius*）一处，但希腊人的赛里斯之名由此出现，则可备一说。详见 H. 裕尔撰，H. 考迪埃修订：《东域纪程录丛》，张绪山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21 页注 27；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 1 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第 17 页；戈岱司编：《希腊拉丁作家远东文献辑录》，耿昇译，北京：中华书局，2001 年，第 1 页。

② 参见戈岱司编：《希腊拉丁作家远东文献辑录》，“导论”以及正文中摘录的维吉尔（Vigile）、霍拉赛（Horace）、普罗佩塞（Properce）、奥维德（Ovide）、斯特拉波（Strabo）、塞内科（Seneque）、梅拉（Pomponins Mela）、普林尼（Pliny）、卢坎（Lucan）、佚名的《厄立特里亚航海记》及托勒密（Ptolemy）、鲍萨尼雅斯（Pausanias）、阿米安·马尔塞林（Ammianus Marcellinus）等的相关记述（第 1—54，71—72 页）。H. 裕尔在整理分析了这些相关史料后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详见裕尔撰，考迪埃修订：《东域纪程录丛》，第 11—12 页。

③ 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1985 年，第 270、272 页。

④ 参见孙培良：《斯基泰贸易之路和古代中亚的传说》，《中外关系史论丛》第 1 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 年，第 3—25 页；保罗·佩迪什：《古代希腊人的地理学》，蔡宗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年，第 22 页；王治来：《中亚史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 年，第 53 页注 1；G. F. Hudson, *Europe and China*, London: Arnold & Co., 1931, pp. 37, 39；马雍、王炳华：《公元前七至二世纪的中国新疆地区》，《中亚学刊》第 3 辑，北京：中华书局，1990 年，第 1—16 页。

⑤ Jorg Biel, “Treasure from a Celtic Tomb,” *National Geographic*, vol. 157, no. 3., March 1980, pp. 429—438.

⑥ С И 鲁金科：《论中国与阿尔泰部落的古代关系》，《考古学报》1957 年第 2 期，第 37—48 页。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章。有的希腊人到巴比伦考察游历，如希罗多德；有的希腊人到波斯的宫廷服务谋生，如担任御医的克泰西亚斯和受波斯国王之命、考察印度河并环航阿拉伯半岛的斯库拉克斯（Scylax，约公元前 510 年？）；① 还有的希腊人自愿或被迫移民到了巴克特里亚和索格底亚那地区。② 波斯帝国的版图西起埃及，北到黑海、里海一线，南到阿拉伯半岛，东到印度西北部。为了巩固对各地的统治，大流士一世在原来道路的基础上，修筑了覆盖全帝国的驿道网（The Imperial Roads）。其中最著名的是帝国西部的“王家大道”（The Royal Road）。它从都城之一的苏萨（Susa），经美索不达米亚，到达小亚的以弗所（Ephesus）或撒尔迪斯（Sardis），全长 2000 多公里，沿途设有驿站（现在已确认的有 22 个）。帝国东部的一条主要交通干线是沿着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米底（Media）之路，进而经巴克特里亚抵达印度。③ 出产于巴克特里亚东部山区的名贵石头——天青石（lapis lazuli）就沿此路线而输送到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④ 亚历山大之前希腊的钱币已在巴克特里亚流通，也说明波斯帝国时期从东地中海到兴都库什山之间有可能存在长途商贸活动。⑤ 这条路线连通中亚和南亚次大陆，实际上成为未来丝绸之路的西段。大流士一世还开通了埃及二十六王朝法老尼科未完成的连接尼罗河与红海的运河。这些驿道和水路加强了各地的联系。应该说在波斯帝国统治范围之内，各地交往的渠道是畅通的。⑥

希波战争以希腊人的胜利而告终，但这并不意味着希波对立的结束。相反，双方都在利用一切机会插手对方的内部事务。希腊城邦之间的争斗和波斯帝国的王位之争均提供了这样的可能。著名的两个例子就是公元前 401—前 400 年间应小居鲁士之邀深入波斯内陆的希腊万人雇佣军和公元前 387 年由波斯国王宣布的旨在解决希腊内部矛盾的“大王条约”（The King's Peace）。半个多世纪之后亚历山大在战场上还碰到了波斯军队中多达数万的希腊雇佣军。⑦ 希腊与波斯之间在政治、军事斗争上的相互介入从另外一个侧面证明了两个文明之间联系的进一步加强。

公元前 4 世纪时，欧亚大陆还存在一些其他的古老文明或正在兴起的文明，但它们或由于地理阻隔的原因，或由于自身发展的原因，与其他文明真正接触和交流的历史机遇似乎还未来临。西地中海的罗马人正在为统一意大利而向南部发展，或许通过大希腊地区的希腊人对东方有所知晓，但他们的视野还没有超出半岛之外。此时的印度尚处于列国时代，逐渐强盛起来的

---

① 希罗多德：《历史》，第 282 页。

② 如希罗多德提到的被波斯人俘虏的非洲希腊人殖民者巴尔卡人（the Barcaeans），他们被大流士一世强迫移居到巴克特里亚（参见希罗多德：《历史》，第 344 页）。或如斯特拉波提到的布兰开德人（the Branchidae），他们因为曾背叛祖国，甘愿随薛西斯（Xerxes）回到波斯，而后被安置到索格底亚那（Sogdiana）地区。参见 Strabo，*Geography*，XI. 11. 4，*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

③ 详见 Josef Wiesehofer，*Ancient Persia：From 550BC to 650AD*，London：I. B. Tauris Publishers，1996，pp. 76—77.

④ Frank L. Holt，*Alexander the Great and Bactria*，Leiden：E. J. Brill，1989，p. 28.

⑤ 1966 年，在阿富汗巴尔赫（Balkh）附近发现一罐钱币，其中绝大多数是希腊古典时期雅典的四德拉克马（tetradrachms），总数不详，但可以公开见到的至少有 150 枚。这些钱币在亚历山大之前很可能在巴克特里亚以银块的形式流通。此前的 1933 年，在喀布尔东面也发现了一处相似的古代窖藏，其中至少有 1000 枚属于希腊城邦的钱币。参见 Frank L. Holt，*Into the Land of Bones：Alexander the Great in Afghanista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5，p. 141.

⑥ 公元前 480 年侵入希腊的波斯军队中就有来自波斯各地、甚至从巴克特里亚、印度远道而来的参战者（希罗多德：《历史》，第 494 页）。这些驿道发挥作用由此可证。

⑦ 在格拉尼卡斯（Granicus）、伊苏斯（Issus）、高加米拉（Gaugamela）三次战役中，波斯军中都有希腊雇佣军助战。详见阿利安：《亚历山大远征记》，第 30—33、57—65、94—99 页。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摩揭陀王国的统治区域尚在恒河流域一带，佛教也未向西大规模传播，但西北部因受波斯帝国统治已与外部世界有所接触。此时的中国正处于战国时期，七雄争霸，逐鹿中原，根本无暇也无力西向。

总之，到公元前4世纪，欧亚大陆诸文明之间有的已有所接触，有的也有所耳闻，但一条连接东西方两端的纽带或通道还未形成。相互间的了解难免肤浅、偏颇甚至谬之千里。中国对西方世界的想象大概不会超出《山海经》、《穆天子传》内容的范围。希腊方面虽通过波斯帝国对埃及、巴比伦、印度等东方古老文明地区均有所知晓，但对真正的中国，似乎仍一无所知。亚历山大只知印度之外是大洋，是东方大地的尽头，并不知锡尔河之外的东方还有一个大国的存在。他对远东世界的认识与一个多世纪以前希罗多德时代的希腊人并无多大区别。①

亚历山大之后东西方交往的扩大和东部希腊化世界的形成

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以希腊—马其顿联军统帅的身份开始了对波斯帝国的征服。十年征战，亚历山大不仅将原来波斯帝国的版图据为己有，而且有所扩大。从地中海到印度河，从黑海、里海、咸海到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几乎被囊括在亚历山大的帝国之下。虽然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23年突然病逝，他的帝国迅即崩溃，被其部将瓜分一空，但希腊—马其顿人对当地民族的统治格局并没有改变。希腊文化成为凌驾于当地文化之上的强势文化，希腊化的进程加快了，与东方文化的交流融合日益广泛深入。希腊化世界的形成，② 大大便利和促进了各希腊化王国之间以及它们与周边地区的交往。由于经济、文化的交流往往大大超出政治统治的区域，在希腊化世界及其周边地区实际上形成了以西亚为中心、以地中海和中亚印度为两端的新的交通体系。

当时的东西方商路主要有三条。北路连接印度、巴克特里亚与黑海。来自印度的货物可经巴克特里亚沿阿姆河（the Oxus）而下，进入里海，再转运至黑海。中路连接印度与小亚，有两条支路：一条先走水路，从印度由海上到波斯湾，溯底格里斯河而上，抵达曾为塞琉古王国都城之一的塞琉西亚（Seleucia on Tigris）；一条全部走陆路，从印度经兴都库什山、阿富汗的巴克特拉（Bactra）、伊朗高原到塞琉西亚城，至此，水陆两路会合，由此跨过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西达塞琉古王国的另一都城，即叙利亚的安条克（Antioch on the Orontes），由此转向西北到达小亚的以弗所。南路主要通过海路连接印度与埃及，从印度沿海到南阿拉伯，经陆路到佩特拉（Petra），再向北转到大马士革（Damascus）、安条克，或向西到埃及的苏伊士（Suez）、亚历山大里亚等地。③ 托勒密王朝一直致力于寻求绕过阿拉伯半岛南部，经红海直达埃

① 参见希罗多德：《历史》，第280页。

② 本文的“希腊化世界”既包括亚历山大及其后继者所直接控制的地区，也包括受希腊或希腊化文化深刻影响的地区。“东部希腊化世界”主要是指除托勒密埃及、马其顿王国之外的塞琉古王国故地及其相邻地区。这一区域，尤其是以巴克特里亚为中心的中亚地区，与丝绸之路的开通密切相关，张骞的见闻也主要来自此地。

③ 详见 W. W. Tarn, *Hellenistic Civilization*, London: Edward Arnold (Publishers) LTD, 1952, pp. 241—245; F. W. Walbank, *The Hellenistic World*, Glasgow: William Collins Sons & Co. Ltd., 1981, pp. 199—200; Strabo, *Geography*, II. 1. 11, 15; XI. 7. 3; Pliny, *Natural History*, VI. 52,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关于北路，斯特拉波的记述最为明确详细，但塔恩（Tarn）断然否认它的存在。本文采用古典作家的记述。不过，他们以为阿姆河注入里海，与现在注入咸海不一致，应予注意。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及的海上通道。托勒密二世重新开通了二十六王朝法老尼科时开凿的连接尼罗河与红海的沙漠运河，这样来自印度的货物就可经运河，沿尼罗河而下，最终抵达地中海的亚历山大里亚。公元前 1 世纪前后，印度洋上季风的发现使海上商路更加便利和安全。① 这些商路与后来丝绸之路西段的海陆走向大致吻合。从中亚通往丝绸产地中国，中间地带也就只剩下从河西走廊到帕米尔高原这一段了，而且这一段的距离也在双方的无意识努力下不断地缩小。

据斯特拉波，大约在公元前 2 世纪前后，中亚的希腊人王国巴克特里亚的统治者欧泰德姆斯（Euthydemus）及其儿子德米特里（Demetrius）曾向东面的赛里斯（Seres）和弗利尼（Phryni）扩张。② 这时西方人心目中的赛里斯估计还是模糊的产丝之地，并非指汉代的中国，至于弗利尼，学界有匈奴说，③ 不过此时匈奴的势力还未到达与巴克特里亚相邻的地区。④ 既然该父子向东面扩展，那东面最相邻的地区也就只能是帕米尔高原（葱岭）和塔里木盆地了。纳拉因（Narain）接受坎宁安（A. Cunningham）的建议，将 Seres 和 Phryni 比附为《汉书·西域传》中的“疏勒”和“蒲犁”确有一定的道理，⑤ 因为汉时疏勒、蒲犁恰恰位于帕米尔东侧的今新疆喀什和塔什库尔干地区。

由此可见，在张骞到达中亚之前的公元前 2 世纪中后期，后来丝绸之路的西段（自帕米尔以西）实际上已经开通，而且此时距亚历山大东征已经两个世纪之久，东部希腊化世界的政治格局和文化面貌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亚历山大的亚洲遗产最终几乎全被他的后继者之一的塞琉古一世（Seleucus Nicator，约公元前 312 —前 280 年在位）所独吞，但好景不长。由于孔雀王国的兴起，塞琉古王国恢复对印度西北部统治的努力落空，只得于约公元前 305 年签约放弃。⑥ 公元前 3 世纪中叶，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总督宣告脱离塞琉古王国独立。紧接着，帕提亚的当地人起义建国（即张骞后来所说的“安息”）。塞琉古王朝无力东顾，逐渐承认了这些既成事实，统治的重心转向两河以西以叙利亚为中心的濒地中海地区。公元前 2 世纪以后，巴克特里亚王国曾越过兴都库什山向印度西北部发展，约半个世纪之后，迫于帕提亚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压力，⑦ 此地的希腊人开始从阿姆河撤退到印度。⑧ 当张骞辗转 10 年大约于公元前 129 —前 128 年之间抵达巴克特里亚时，此地已被来自中国西北的月氏人所征服。⑨ 张骞称其为“大夏”。

---

① 参见 F. W. Walbank, *The Hellenistic World*, pp. 200 —204.

② Strabo, *Geography*, XI. 11. 1.

③ G. F. Hudson, *Europe and China*, p. 58.

④ 据《史记·匈奴列传》，匈奴前虽击败月氏，但“夷灭月氏……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在汉文帝前元四年（公元前 176 年）。此前巴克特里亚希腊人不可能越过月氏远至匈奴。

⑤ 参见 A. K. Narain, *Indo-Greeks*, Appendix II,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7, pp. 170 —171.

⑥ 塞琉古一世以同意联姻和接受 500 头大象的回赠为条件放弃了对印度西北部的统治权。参见 Strabo, *Geography*, XV. 2. 9.

⑦ 在欧克拉提德（Eucratides，约公元前 175 —前 145 年在位）及其后继者统治时期，帕提亚曾夺取了巴克特里亚的一部分。参见 Strabo, *Geography*, XI. 9. 2; 11. 2.

⑧ 他们在印度西北部一直残存到公元前 30 年左右才彻底消失，被印度学者纳拉因称为“印度—希腊人”(Indo-Greeks)，认为“他们的历史是印度历史的一部分，而非希腊化国家的一部分；他们来了。他们看见了，但他们被印度人征服了”。(A. K. Narain, *Indo-Greeks*, p. 11) 此说值得商榷。这些希腊人后来确实被印度文化同化了，但他们在当地维持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统治，留下了影响至今的最大的希腊化文化遗产之一——犍陀罗佛教艺术，他们的存在与活动应该视为希腊化世界历史的一部分。

⑨ 关于巴克特里亚王国的灭亡者，古代中西记载并不一致。据《史记·大宛列传》，大月氏人“西击大夏而臣之”，巴克特里亚被大月氏所灭。据斯特拉波记载，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王国亡于来自锡尔河彼岸的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这就是张骞进入大夏时西亚、中亚和印度的政治格局。希腊人在这些地区的控制范围确实比亚历山大帝国时大为缩小，但希腊文化的影响却呈现另外一番景象。希腊人所到之处，都要建立希腊式城市或殖民地。据统计，亚历山大及其后继者在东方建城（包括殖民地）至少在300个以上，其中保留下名称者约275个。它们主要分布在东地中海沿岸（约160个），其余的则在幼发拉底河中下游及其以东地区，在巴克特里亚及其相邻地区有名可据者有19个（其中亚历山大建了8座①），在印度有27个。② 这类希腊式城市已被20世纪60年代在阿富汗阿伊·哈努姆遗址的考古发掘所证实。③ 它们通常建于统治的中心地区、交通要道或军事要塞，是希腊—马其顿人统治网络的核心组成部分。城中一般建有希腊式的神庙、体育馆、剧场，居民也以希腊人为主。城中充溢着浓厚的希腊文化气息，希腊语、希腊钱币、希腊的神祇、希腊的戏剧、希腊的习俗使远在东方的希腊人有一种生活在故国家园之感。相对于广袤的东方之地，这些城市犹如沙漠中的绿洲。它们力图维护希腊文化的纯洁性和统一性，并试图对周围的世界施加影响，但由于处于当地民族、当地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这些城市中的希腊殖民者也难免吸收一些东方文化的因素。因此在希腊人控制与影响的地区，就逐渐形成了一种以希腊文化因素为主，同时融合其他东方文化因素的多元混合文化，即近代学术界所称之的“希腊化文化”（Hellenistic Culture）或“希腊化文明”（Hellenistic Civilization）。

就张骞所耳闻目睹的巴克特里亚及其周边地区而言，其文化面貌的变化尤为明显。据斯特拉波，亚历山大时代的巴克特里亚人和索格底亚那人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与游牧民族并无多大区别，④ 但在希腊人统治之下，巴克特里亚人的定居和城镇化进程加快，成了所谓的“千城之国”。⑤ 帕提亚虽然政治上脱离了塞琉古王国，在文化上却长期以效仿希腊为荣。它采用塞琉古

---

① Asii、Pasiani、Tochari 和 Sacarauli 四个部落（Strabo, *Geography*, XI. 8. 2.）。本文主要采用司马迁说，因为张骞在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刚刚被征服就来到此地，这是他的实地考察结论，应该更为可靠。斯特拉波所说也有一定的可能性，但前提是要像塔恩、纳拉因那样，把 Tochari（吐火罗）比附为大月氏。若此，则中外记载趋于接近。参见 W. W. Tarn, *The Greeks in Bactria and India*, Cambridge: 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1, pp. 277, 286, 533; A. K. Narain, *Indo-Greeks*, p. 129.

① Strabo, *Geography*, XI. 11. 4.

② M. Cary, *A History of the Greek World*,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59, pp. 244—245.

③ 关于这一遗址的希腊式特征，详见主持发掘的法国考古队负责人 Paul Bernard 的三篇文章：“An Ancient Greek City in Central Asia,” *Scientific American*, vol. 246, Jan. 1982, pp. 148—159; “Ai khanum on the Oxus: A Hellenistic City in Central Asia,”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vol. 53, 1967, pp. 71—95;《中亚的希腊王国》，载雅诺什·哈尔马塔主编：《中亚文明史》第2卷，徐文堪、芮传明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第67—93页。其第3章“亚历山大及其在中亚的后继者”也有若干关于该遗址的介绍。Bernard 是撰稿人之一。1979年以后，该遗址的大规模发掘由于战乱而中断，但近年来此地仍出土了一些希腊化的艺术品，如赫拉克勒斯和雅典娜的雕像。见 Frank L. Holt, *Into the Land of Bones: Alexander the Great in Afghanist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pp. 162—163; 也可参考杨巨平：《阿伊·哈努姆遗址与“希腊化”时期东西方诸文明的互动》，《西域研究》2007年第1期，第96—105页。

④ 比如，巴克特里亚人虽然比索格底亚那人稍文明一些，但他们都将孤苦无助的老年人或病人活活地扔出，让专门为此而养的狗吃掉。巴克特里亚人的城外看上去倒还整洁，但城内的许多地方白骨累累。亚历山大到此地后，废除了这种陋习。斯特拉波此说来自亚历山大的随行者、传记作家欧奈西克瑞塔斯（Onesicritus），他认为后者并未报道巴克特里亚人最好的特征，似有以偏概全之嫌。参见 Strabo, *Geography*, XI. 11. 3.

⑤ 据斯特拉波，巴克特里亚希腊人国王欧克拉提德在位时统辖着1000个城市。其资料来源于 Apollodorus 的《帕提亚史》（*The Parthica*）。详见 Strabo, *Geography*, XV. 1. 3.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朝的历法，模仿希腊式的钱币，雕塑希腊的神像，上演希腊的戏剧，① 宫廷还附设体育馆。② 印度的那些希腊人小王国虽然受印度文化的影响较深，有的希腊人（如著名的米南德国王）皈依了佛教，③ 有的国王开始铸造标有印度文字的双语币。但其钱币形式仍保持着希腊式钱币的基本特征，如正面是国王头像、希腊语的国王名字与荣誉称号，反面以希腊神祇为主，但出现了当地的佉卢文。由于受巴克特里亚希腊化艺术流派的影响，佛教犍陀罗艺术也有可能在这时萌芽。

张骞就是在这样的政治和文化背景下来到了东部希腊化世界，来到了中亚，确切地说是来到了以锡尔河和阿姆河为中心的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的昔日所在地。那他在此地看到和听到了什么呢？

张骞西域凿空与希腊化文化信息的随之传入

据《史记·大宛列传》，张骞曾受汉武帝之命，先后两次出使西域，第一次是在公元前 139—前 126 年间。除匈奴外，他先后经过了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四个地区，另外还听到了关于乌孙、奄蔡、安息、条支、身毒等其他五个大国的传闻。第二次出使是在公元前 119 年—前 115 年间，他先到乌孙，然后分遣副使到“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寘、扜罙及诸旁国”。张骞之行，标志着后来所称之的“丝绸之路”的全线贯通，西域的信息首先传入内地中原。第一次出使归来，张骞就向汉武帝详细报告了他在西域的所见所闻。从司马迁的记述看，张骞对各地的介绍内容大致一致，只不过有详略之分而已，这大概是根据对它们了解的多少而定。但无论如何，这是张骞对希腊人所曾控制过、影响过的地区实地考察之后带回的第一手资料，是迄今中原汉地得到的关于西域诸国的第一份报告。其中蕴含的信息不能不详加分析，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其中是否传递了一些当地留存下来的希腊化文化信息？

从《大宛列传》有关记载看，除了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四个“行国”外，司马迁对其余的农耕、定居国家记述都比较详细，大致包括方位（包括道里、邻国）、物产、城邑、人口、统治形式、商贸等情况。

从方位上看，康居、乌孙、奄蔡都是活动于里海、咸海、天山、阿尔泰山一线的游牧民族，远在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控制范围之外。据司马迁，大月氏始“居敦煌、祁连间”，后定居于阿姆河之北，是它征服了大夏。它虽然占据了原来巴克特里亚王国的一部分，但刚刚立足，游牧民族传统浓厚，并未受到当地希腊化文化的浸染。司马迁称其“行国”，在当时是恰如其分的。大宛一般被认为是现在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坦三国交界的费尔干纳及其周边地区。此地属于亚历山大时代的索格底亚那（Sogdiana），后来纳入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

---

① 公元前 53 年，罗马统帅克拉苏在与帕提亚人的卡雷（Carrhae）战役中身亡。当他的头颅被送到帕提亚宫廷时，那里正上演着希腊悲剧家幼里披底斯的剧目《巴卡》（*Bacchae*）。这说明希腊语在帕提亚上流社会非常流行。普鲁塔克还特别提到现场的另一位客人亚美尼亚国王阿塔瓦斯德斯（Atarvasdes），他不仅能和宫廷宴会的主人、帕提亚国王许罗德斯（Hyrodes，或 Orodes）一样通晓希腊语，一起欣赏希腊诗篇的朗诵和戏剧的表演，而且还能用希腊语写作悲剧、演讲词和历史。希腊语的流传范围之广，希腊化文化的渗透力之强由此可见一斑。参见 Plutarch，*Crassus*，XXXIII，*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

② 关于上述帕提亚的希腊化文化表征，也可参见 R. L. Fox，*Alexander the Great*，London：Futura Publications Limited，1975，pp. 492、493；Josef Wiesehofer，*Ancient Persia：From 550 BC to 650 AD*，pp. 124—129.

③ 参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43 卷“论集部”《那先比丘经下》；Plutarch，*Moralia*，821D，*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的统辖范围，① 或者至少是受其强烈影响的地区。安息（帕提亚，Parthia）希腊化程度较深，是个典型的“爱希腊帝国”（Philhellenic Empire）。② 它的许多国王在钱币铭文中也都自称为“爱希腊者”（ΦΙΛΕΛΛΗΝΟΣ）。至于大夏、条支以及身毒的一部分（印度西北部）则都是亚历山大帝国的故地。张骞抵达时，条支（安条克，仍是塞琉古王国的首都，故以此代之），即塞琉古王国仍然残存；大夏，即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则刚刚灭亡，残余退往印度。因此，张骞在这些地方获得的印象，完全有可能包含着希腊化文化的信息。

从物产上看，这些地区大多既产粮食（稻、麦），也种植葡萄，且善于酿制和保存葡萄酒。葡萄并非起源于希腊半岛。据考证，它的种植以及葡萄酒的酿造始于今日小亚土耳其的东部，时间大致在公元前 8500 —前 4000 年间，而后向东西方向传播。③ 希腊人得地利之便，克里特文明时期已知种植葡萄，酿造葡萄酒，到荷马时代，葡萄和葡萄酒成为他们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酒神崇拜是希腊神话传说和宗教信仰的主题之一。希腊的悲剧就是从酒神大节的祭仪中发展而来。因此，希腊人在他们统治的地区种植或扩大种植葡萄，并传来先进的葡萄酒酿造技术是完全可能的。他们在两河流域南部的巴比伦和苏西斯（Susis）地区首次引入了自己当地的葡萄种植技术（不挖地沟，用带有铁尖的木棒在地上直接穿洞，然后把葡萄苗植入其中）。④ 另据斯特拉波，与巴克特里亚毗邻的阿利亚（Aria）和马尔基亚纳（Margiana）地区也都适于种植葡萄，阿利亚尤盛产葡萄酒，此酒能保存三代而不变质。⑤ 这一现象在中国方面的记载中也得到了证实，据《史记·大宛列传》，安息的特产之一就是“蒲陶酒”，大宛及其周围地区也是“以葡萄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由此可见，至少在张骞到达西域之前，葡萄种植以及葡萄酒的酿造在此地已非常普遍。东西两方对中亚地区盛产葡萄及葡萄酒的相似记载，绝非历史的巧合，而是对同一地区同一物产的真实反映。张骞之后，葡萄栽培技术首先通过丝路传入中原汉地。⑥ 汉语中“蒲陶”一词的发音与希腊语表示“葡萄串”和复数“葡萄”的βότρυς（botrus）发音相近，有可能是音译而来。⑦

---

① 据斯特拉波，巴克特里亚希腊人曾统治了索格底亚那东面，位于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地区（参见 Strabo, *Geography*, XI. 11. 2）。此方位应包括费尔干纳盆地。

② 汤因比认为它是希腊文化的“保护者、赞助者”。参见 A. Toynbee, *Hellen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 183.

③ William Cocke, “First Wine? Archaeologist Traces Drink to Stone Age,” *National Geographic News*, July 21, 2004. http://news.nationalgeographic.com/news/2004/07/0721_040721_ancientwine.html.

④ Strabo, *Geography*, XV. 3. 11.

⑤ Strabo, *Geography*, XI. 10. 1—2.

⑥ 《史记·大宛列传》中载：“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馆旁尽种葡萄、苜蓿极望。”

⑦ 参见 Henry George Liddell and Robert Scott, *A Greek-English Lexicon*, with a revised supplemen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6, “βότρυς”, p. 323；罗念生、水建馥编：《古希腊语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年，第 156 页。沙畹：《中国之旅行家》，载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 2 卷，北京：商务印书馆，第 7 页。此说早在 1837 年就由一位名为 Ritter 的学者提出，虽后有学者重申，但伯希和仍表怀疑（详见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 1 卷，第 82—83 页）。美国学者劳费尔对此持不同意见，认为“蒲桃”（“蒲陶”）一词是波斯语 Budawa 的对音，与希腊语的“Botrus”无关。参见劳费尔：《中国伊朗篇》（*Sino—Iranica*），林韵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年，第 49—51 页。但此书出版于 1919 年，其中有些结论显然已经过时。如他说“希腊语在伊朗领土的影响是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城邑众多、人口繁盛也是这些地区的一大特点。大宛“有城郭屋室。其属大小七十余城，众可数十万”；安息“城邑如大宛。其属大小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为大国”；大夏“有城屋，与大宛同俗。无大君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大夏民多，可百余万”。这些地方如此众多的城邑是否与亚历山大倡导的建城运动有关呢？答案是肯定的。如前所述，希腊人每到一地欲长期定居，必定建立与本土相似的城市或殖民地。对于希腊人而言，城市是城邦的中心和载体。城市不仅是生活居住之地，更重要的是政治、文化、教育、宗教活动的中心。他们对城市生活有着无比深厚的情感寄托和难以割舍的精神联系。在远离祖国约 5000 公里的遥远东方，他们或为保持民族文化特征，或为更好的对当地进行统治，必然更加倾向于建城而居。从阿伊·哈努姆遗址能容纳 5000 名观众的剧场规模来看，① 希腊人不仅是希腊式城市中居民的主体，而且为数不少。希腊化的当地人一定也可光临剧场。② 这是迄今为止在东方所发现的最大的希腊式剧场。③ 张骞在此时此地发现如此众多的城邑应在情理之中。他的报告也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西方古典作家笔下的那些关于希腊统治者热心建城的记载。希腊人虽然是统治民族，但他们毕竟是外来移民，在这些地方数十万、上百万居民中只能是很少的一部分。难以设想原来的为数不多的希腊驻军能够在二百年间繁衍出如此多的人口。④ 我们也不能设想这些城市都是希腊式城市，不能设想这几十万、上百万人口都居住于城市之中。城邑的周围一定是种植着小麦、水稻、葡萄的乡村，这些劳作者也一定是当地人为主。但希腊式城市的存在是事实，“千城之国”的说法也并非漫无边际的夸张。张骞的有关记述间接证明了各希腊化地区城市的数量之多，阿伊·哈努姆遗址则直接证实了至少有一部分城市具有希腊式特征。

这些地区的政治统治形式，也同其他希腊化王国一样，实行君主制，但贵族、地方首领、城市首脑似乎在关键时刻也会发挥重要作用。大宛拒绝献马，并令“攻杀汉使”，在被汉军围困

---

① 微而又微的：突厥斯坦的古代文稿里也未曾发现过任何与希腊有关的事物”，并以此为据推断葡萄和 βότρυς 没有关系。而近百年来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已经证明，希腊语在这些地区不仅通行，而且留下了不少相关的碑铭、钱币和纸草文献等实物资料。值得注意的是，随葡萄同时传入的“苜蓿”一词与希腊语表示苜蓿的“Μηδικός”一词的谐音也似乎有关（劳费尔对此也持否定意见，认为它与伊朗语的 buksuk 或 buxsux，buxsuk 有关，详见《中国伊朗篇》，第 35—37 页）。据斯特拉波，米底（Media）地区有一牧场，盛产苜蓿。这是马最爱吃的一种草。因产于米底，故被希腊人称为“米底草”（Medic，Μηδικη πόα）。参见 Strabo，*Geography*，XI. 13. 7；Henry George Liddell and Robert Scott，*A Greek-English Lexicon*，“μηδίζω”，p. 1125.

① Paul Bernard，“An Ancient Greek city in Central Asia，” *Scientific American*，vol. 246，Jan. 1982，pp. 148—159.

② 普鲁塔克曾在《论亚历山大的幸运或美德》（*On the Fortune or the Virtue of Alexander*）一文中写道：“当亚历山大使亚洲文明化之时，荷马的诗作被广泛阅读，波斯、苏西亚那人（Susianian）、格德罗西亚人（Gedrosian）的孩子们都学习并能够谈论索福克里斯和幼里披底斯的悲剧”。参见 Plutarch，*Moralia*，328D. 看来普鲁塔克的说法还是有一定的根据，并非无中生有的想象。

③ Frank L. Holt，*Into the Land of Bones: Alexander the Great in Afghanistan*，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5，p. 156.

④ 亚历山大离开此地进军印度前留下 13500 名士兵（参见阿利安：《亚历山大远征记》，第 147 页），但这个数字是否包括已经安置在城镇中的那些希腊人和老弱伤残、不能再服役的马其顿人，不得而知。但在公元前 323 年亚历山大逝世后，帝国东部诸行省的殖民地中，至少还有 23000 名希腊—马其顿军人存在。参见 Frank L. Holt，*Alexander the Great and Bactria*，pp. 81，88.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时又“相与谋”杀国王毋寡，① 集体与汉议和，宛贵人几乎是整个事件的主谋。② 这些宛贵人遇事能“相与谋”，且达成共识，并敢弑杀其王，这是否可理解为在大宛，有类似于其他主要希腊化王国的宫廷议事会这样的机构存在呢？这些贵人是否就是这种议事会的成员呢？张骞到达大夏时，此地“无大君长，往往城邑置小长”，这可否理解为巴克特里亚王朝已经退到印度，这里只剩下一些城市和地方的首领在维持着一方平安呢？

张骞在介绍安息和大夏时，提到这两地“有市”，“善贾市”，还提到大夏的都城蓝市城，“有市贩贾诸物”。此外还向汉武帝提到他在大夏见到了来自中国西南地区的邛竹杖和蜀布。这一事例证明了此时以中亚巴克特里亚为中心连接西亚、南亚、东亚地区的商贸网络的存在。属于这一时期的大量希腊钱币的出土说明货币交换在希腊化王国及其周边地区已经广泛流行。③ 张骞的报告中也特别提到了这一点。因为他所见到的钱币与中原汉王朝的圆形方孔钱大不相同。他在关于安息的报告中特别提到了此地“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王死辄更钱，效王面焉”。这里传递了几个与希腊化王国钱币相似的信息：第一，钱币是银制的；第二，钱币上有国王的头像；第三，王死则换钱，正面的头像随之更换，继位者取而代之。王像打压于币是希腊化时期铸币的通行方式。亚历山大东征之初，就在埃及的孟菲斯发行过一种有自己肖像的铜币，④ 征服印度后，他还发行过一种大徽章，上有自己骑马与乘象的印度国王作战的图案。⑤ 亚历山大死后，托勒密一世在公元前 318 年也发行过有亚历山大头像的钱币，但真正创制亚历山大头像标准币的是他的另外一位部将莱辛马库斯（Lysimachus，公元前 323 —前 281 年在位，约公元前 297 年开始发行）。⑥ 亚历山大的其他后继者纷纷效仿，他们自立为王后，也多将自己的头像铸到币上，成为王权的一种象征。这种钱币不只在希腊人统治的地区流行，那些相邻的由当地人统治的地区，如帕提亚，也都坚持铸造和使用这样的钱币。

从目前所能搜集到属于这些地区的希腊式钱币资料上看，它们从成色上可分为金、银、铜、铁、铅数种，以重量或币值可分为斯达特（Stater）、德拉克马（Drachm）、四德拉克马（Tetradrachm）、奥波尔（Obol）四种。但就帕提亚而言，现在发现的几乎全是银币，金币极为罕见，可能只用于纪念性的馈赠，并不用于流通。铜币由地方铸造。帕提亚银币的正面是在位

---

① “毋寡”之名，似是希腊化时期钱币铭文中对国王的赞词“ΜΕΓΑΣ”（Megas，伟大的）的音译。古钱币学资料证明，贵霜时期有一无名王（Nameless King，即币上无其本人名字，这是一种罕见的现象），其赞词为“ΣΩΤΗΡ ΜΕΓΑΣ”（Soter Megas，伟大的救世主），可见 Megas 或可代称王名（参见上海博物馆编：《上海博物馆藏丝绸之路古代国家钱币》，No. 1224 —1228，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 年，第 211 —212 页）。《史记》中的“毋寡”是否即 Megas 之转音，仍难以确定。此说经清华大学张绪山教授提示，谨此致谢。

② 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

③ 自从 1735 年第一枚属于巴克特里亚希腊人国王欧克拉泰德斯的银币（ΒΑΣΙΛΕΩΣ ΜΕΓΑΛΟΥ ΕΥΚΡΑΤΙΔΟΥ）面世以来，不计其数的希腊式钱币在这一带出土。最为典型的是 1992 年在阿富汗 Mir Zakah 村发现的一座钱币窖藏，出土总数估计约 55 万枚，几乎是所有已发现的希腊和马其顿窖藏总量的 6 倍。这些钱币均流向日本和欧美。详见 Frank L. Holt, *Into the Land of Bones: Alexander the great in Afghanistan*, pp. 125 —148.

④ Ian Carradice and Martin Price, *Coinage in the Greek World*, London: B. A. Seaby Ltd., 1988, p. 109.

⑤ Ian Carradice and Martin Price, *Coinage in the Greek World*, p. 116; Margarete Bieber, “The Portraits of Alexander,” *Greece and Rome*, 2nd Ser., vol. 12, no. 2, Alexander the Great (Oct., 1965), p. 185, Fig. 12.

⑥ Ian Carradice and Martin Price, *Coinage in the Greek World*, p. 120; Margarete Bieber, “The Portraits of Alexander,” *Greece and Rome*, 2nd Ser., vol. 12, no. 2, p. 186, Fig. 13a.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国王的头像，反面一般是一持弓而坐的弓箭手形象（有学者认为此为开国君主阿尔萨息①），或命运女神（Tyche）、胜利女神（Nike）、农业女神（Demeter）、赫拉克勒斯（Herakles）等希腊神祇的形象。帕提亚钱币上的铭文通常都是希腊语，内容包括开国君主阿尔萨息（ΑΡΣΑΚΟΥ，Arsaces）的名字（也可视为王朝名），以及对他的赞语，如“伟大的国王”（ΒΑΣΙΛΕΩΣ ΜΕΓΑΛΟΥ）、“王中王”（ΒΑΣΙΛΕΩΣ ΒΑΣΙΛΕΩΝ）、“正义者”（ΔΙΚΑΙΟΣ）、“神的显现者”（ΕΠΙΦΑΝΟΥΣ）、“爱希腊者”（ΦΙΛΕΛΛΗΝΟΣ）等。②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铭文正面并无在位国王的名字，从而给后人增加了辨认的困难。在四德拉克马币上还有铸造年代和月份的标记，以塞琉古纪年的开始——公元前 312 年来计算。③ 前述张骞对安息（帕提亚）钱币的介绍虽然简单，寥寥数语，但其基本特征完全可以得到考古学、古钱币学的证实。张骞所见的这种钱币一定是希腊式的钱币，这也是当时当地唯一通行的货币。后来由月氏人建立的贵霜王国也采用了这种钱币的样式。《汉书·西域传》中在记述罽宾、乌弋山离、安息、大月氏时，仍提到了类似的钱币，充分说明了希腊式钱币影响范围的扩大和持久。可以说，关于安息钱币的描述是张骞带回中原的最确切无疑的希腊化文化信息。

此外，在关于安息的报告中，张骞还带回了一则非常重要、但长期以来不为人所注意的与希腊化文化有关的信息，即安息人“画革旁行以为书记”。以皮革作为书写的材料，据考证，在埃及第四王朝法老时期（约公元前 2750 年）就已开始使用，④ 如用于墓中的陪葬品“死人书”。希罗多德在《历史》中也说过，希腊的爱奥尼亚人在未得到埃及的纸草纸以前，是在山羊和绵羊的皮子上书写的，并说甚至在他的时代，还有许多外国人是在这样的皮子上写字的。⑤ 可见，用皮革作为书写材料由来已久。但后来的羊皮纸（拉丁文 pergamena；英文 parchment）一词却来自小亚的另外一个希腊化王国的国名帕加马（Pergamum）。据说，为了打破托勒密埃及对纸草纸出口的封锁，帕加马的国王欧墨涅斯二世（Eumenes II，公元前 197 年即位，死于公元前 160 年或前 159 年）创造了羊皮纸。⑥ 但实际上，可能是帕加马人改进以前的加工程序，造出了另外一种光滑洁白、可双面书写的皮革纸。安息与小亚和塞琉古王国相邻，首先得到这种羊皮纸也有可能。20 世纪考古学者在阿伊·哈努姆遗址内发现了书写有希腊诗文的羊皮纸的遗迹，⑦ 在另外一地还发现了一张属于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时期（约公元前 180—前 160 年）Asangorna 城的希腊语羊皮纸收据，⑧ 证明羊皮纸也早已传入张骞所亲临的大夏。因此，张骞有

---

① Josef Wiesehofer, *Ancient Persia: From 550 BC to 650 AD*, p. 128.

② 关于帕提亚钱币上的希腊语铭文，详见 http://www.parthia.com/parthia_inscriptions.htm#Greek; http://www.parthia.com/scripts/url.asp. 这些铭文的语法多为属格。为方便表述，这里按国际学术界的惯例，以主格形式译出。有学者曾依此惯例，将帕提亚钱币上的铭文加以纠正。如 ΑΡΣΑΚΟΥ 可改为 ΑΡΣΑΚΗΣ，ΒΑΣΙΛΕΩΣ ΜΕΓΑΛΟΥ 可改为 ΒΑΣΙΛΕΥΣ ΜΕΓΑΣ，等等。

③ 关于此类希腊式钱币，国外各大博物馆和私人收藏为数颇丰，钱币学家、历史学家甚至可以据此复原各地王朝的世系。详见相关网站的实物图像资料：http://parthia.com/parthia_coins.htm; http://www.grifterrec.com/coins/coins.html.

④ Meir Bar-Ilan, *PARCHMENT*, http://faculty.biu.ac.il/~barilm/parchmen.htm.

⑤ 希罗多德：《历史》，第 370 页。

⑥ Pliny, *Natural History*, XIII. xxi.

⑦ 参见 Josef Wiesehofer, *Ancient Persia: From 550BC to 650AD*, p. 114; Frank L. Holt, *Into the Land of Bones: Alexander the great in Afghanistan*, p. 160.

⑧ Frank L. Holt, *Thundering Zeus: The Making of Hellenistic Bactr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p. 176.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可能亲眼看到了这种羊皮纸以及上面从左向右横写的文字，并对此大感惊讶。因为当时中原还是用竹简作为书写材料，且是上下竖写。此外这些书写于帕提亚（安息）羊皮纸上的文字也有可能是希腊语，这是当时希腊化各地通行的语言，也是帕提亚上流社会的时髦语言。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曾说道，“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这相互知晓的语言大概除了当地原来的伊朗语之外，还应该包括这种通用希腊语（κοινή，common tongue）。① 张骞应该是亲耳听到过这种语言的，不然怎么会将βότρυς（botrus）音译成“蒲陶”呢？

应该说，张骞确实进入了一个和中原汉地完全不同的文化环境之中，他的所见所闻，确实包含着希腊化文化的信息。从这个意义上看，张骞不仅是出使西域、由中原走向世界的第一人，而且是把希腊化文化信息带回中原的第一人。他的西域凿空与亚历山大的东征，从不同的方向沟通了欧亚大陆古代诸文明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经济联系。从此，中国的丝绸、漆器、铁器（Seric iron，实则钢铁合成的制品，包括炼钢术）、皮制品，甚至杏树、桃树的种植术都开始向西传去，有的很快就传到了罗马。② 而西域的各种特产、奇物、乐舞、宗教也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原，其中最具希腊化文化明显特征的就是融佛教精神和希腊造型艺术为一体的印度犍陀罗艺术，这是继张骞之后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原的唯一的、也是最可以明确辨认的希腊化文化信息。

综上所述，丝绸之路的开通，既要归功于中国方面汉武帝的经略西域，张骞的万里凿空，也与希腊方面亚历山大东征以及希腊化世界的形成密切相关。正是这种中希方面的相向而进才“无心插柳柳成荫”，最终贯通了这条连接中西、影响深远的千年之路。

〔作者杨巨平，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300071〕

（责任编辑：舒建军）

① 参见 W. W. Tarn，“Notes on Hellenism in Bactria and India，”*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vol. 22，1902，p. 278. 他在肯定伊朗语是当地流行语言的同时，也提到了希腊语在城市中的使用，但认为无据可证。这种情况在其后一个世纪以来的考古发掘资料中已得到有力的证实，如希腊语的钱币、铭文、羊皮纸、纸草纸文献残片等。

② 参见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Pliny，*Natural History*，XXXIV. 145. 来自中国的丝绸实物残片已在公元 1—3 世纪的叙利亚帕尔米拉古城遗址中发现。参见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 Albert E. Dien 在《丝绸之路》（*Silk Road*）网络版 2004 年第 2 卷上发表的“Palmyra as a Caravan City”一文。http：//www. silk-road. com/newsletter/2004vol2num1/Palmyra. htm；也可参见 Josef Wiesehofer，*Ancient Persia：From 550BC to 650AD*，p. 147.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Manor Courts, Rural By-Laws and the Medieval "Common Land Community"

ZHAO Wenhong (138)

The management of the common land communities that endured for a long time over a wide area of rural Europe was a mixture of autocratic rule by the feudal lords with democratic elements. The highest power of the community - the manor court and the village council - was usually composed of all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both serfs and yeomanry.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by-laws, the highest form of law in common land communities, and other policies in most cases required the agreement of all members.

The Eastern Conquests of Alexander the Great and the Opening of the Silk Road

YANG Juping (150)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empire of Alexander the Great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Hellenized world promoted cultural and economic exchanges among the ancient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India,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and Europe. Before the time of Zhang Qian, there were already three trade routes connecting East and West. Hellenistic culture was widely adopted in the areas under the control and influence of Greek Macedonians, and to a certain extent converged with Eastern cultures. With the Oxus River as a center, the Bactrian Greeks extended their power to India in the south and to the Seres and the Phryni in the east. They may have crossed the Pamirs to the Tarim Basin. All this provided broad and strong foundations for the opening up and extension of the Silk Road and for further material and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East and West. In this regard, Alexander's eastward expeditions and Zhang Qian's missions to the Western Regions played similar roles in opening up the Silk Road.

"The Turkish Blockade of Trade Routes" and Western Coloniz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WANG Sanyi (162)

It remains a commonly accepted view that Europeans explored new trade routes only after the Turks blockaded the old ones. However, the Ottoman Empire was still rising when the Portuguese ventured forth. At the time when the Portuguese reached India, the Turks did not yet have a firm grip o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Egypt and Syria. After successfully pillaging West Africa, the Portuguese became unwilling to seek wealth through normal commercial dealings rather than plunder, so deliberately avoided the trade set-up maintained in the Mediterranean by the Italians and the Arabs. The argument that the Turks blockaded the trade routes is based on an exaggeration of "the Turkish threat" and hostility toward Muslims. In this respect, the makers of public opinion were the later rather than the earlier European colonizers. The actions of the former in the Near East have exposed their earlier ambitions.

Research Notes

Muke Script from the Karakhoto Site in Russian Collections: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SUN Jimin and DU Lihui (171)

Original Manuscripts, Copies and Collated Versions of Classical Works in the West

ZHANG Qiang (179)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